

中国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梁启超与西学东渐

郭 刚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国早期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梁启超与西学东渐

人 民 出 版 社

000000

责任编辑:杜文丽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吕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梁启超与西学东渐/郭刚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8724-5

I. 中… II. 郭…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中国-近代 ②东西文化-文化交流-研究-中国-近代 IV. D61 G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3727 号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ZHONGGUO ZAOQI MAKESI ZHUYI DE CHUANBO

——梁启超与西学东渐

郭 刚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266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724-5 定价:43.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梁启超传播西学的历史背景	(4)
第一节 清末西学与赴日热潮	(4)
第二节 明治日本的西学氛围	(13)
第三节 接受西学的渠道与传播西学的园地	(17)
第二章 梁启超对“泰西社会主义”之源——希腊学说的介绍	(22)
第一节 “论希腊古代学术”	(23)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	(31)
第三章 梁启超对西方哲学的介绍	(38)
第一节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	(39)
第二节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	(50)
第三节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	(62)
第四节 “天演学初祖”与“进化论革命者”	(72)
第四章 梁启超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	(81)
第一节 霍布斯“契约”立国与斯宾诺莎的“民主政治”	(81)
第二节 “法理学大家”与“民约论巨子”	(90)
第三节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	(103)
第四节 “麦喀士”与“社会主义”	(116)

第五章 “新民说”中的西方近代精神与意识	(125)
第一节 竞争意识	(126)
第二节 独立自由精神	(133)
第三节 权利与义务意识	(142)
第四节 公德意识	(147)
第六章 与梁启超同期赴日学人对西学的传播	(153)
第一节 章太炎对西方哲学的传播	(153)
第二节 马君武对西学的译介	(180)
第三节 同盟会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	(198)
第七章 对梁启超等人传播西学的评价	(204)
第一节 梁启超传播西学的特点	(204)
第二节 梁启超在中国的西学传播史上的贡献	(214)
第三节 梁启超及同期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影响	(224)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反思	(233)
第一节 梁启超传播马克思学说缘由辨析	(233)
第二节 清末赴日学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247)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意义	(259)
结 语	(270)
附录	
1. 梁启超探索强国场域	(274)
2. 梁启超的自由观	(291)
3. 梁启超的功利观	(305)
参考文献	(316)

引 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中国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和飞速的发展。这种变化与发展固然有着思想自身的逻辑依据和深刻复杂的社会原因,但是,也与此时传入的大量西学(西方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学涌进的浪潮中,马克思主义也被很早地传到中国。这些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西学主要是通过何种渠道、由何人传入?又有哪些具体内容?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有何意义?它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轨迹如何?本文试图以梁启超为中心,同时兼及清末其他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工作,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性的研究。

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历史背景作了考察,第二章对梁启超传播的“泰西社会主义”之源作了介绍,第三章对梁启超传播近代西方哲学作了梳理,第四章论及了“梁启超介绍的西方政治思想”,第五章论述了梁启超“新民说”中的西方近代精神和意识,第六章对与梁启超同期其他赴日学人传播西学工作进行了探讨,第七章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特点、贡献和影响以及与同期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影响诸方面作了评价,第八章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行了历史反思。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既是一个多产的学者,又是位难得的传播西学的启蒙大师,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戊戌变法的失败迫使梁启超败走“麦城”，逃亡日本。在流亡日本的14年中，梁启超传播了大量西学，成为中国人较早地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梁启超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对西学作了广泛的传播，从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尔再到康德，从孟德斯鸠到卢梭再到马克思，从达尔文到赫德再到边沁……西方的各种学说、流派，都一一涉猎。近代西方的自由、民权、进化、文明、科学等概念和思想都一股脑儿地涌进来。其他同期的赴日学人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如章太炎对西方哲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作了译介，马君武对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和自由主义等国家政治学说和哲学思想作了有益的传播，以朱执信等为代表的同盟会学人重点对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进行了广泛的介绍。不过，无论在传播数量，还是在介绍深度以及社会影响上，梁启超均居领先地位。

清末赴日学人的大规模译介西学，使明清之际以来的西学东渐真正达到了它的勃兴期，此时西学的传播是空前的，不仅传播的主体转为中国人，使西学东渐由被动转为主动；而且译介西学规模大大超过以前，使得西学的“真髓”被引进来。换言之，赴日学人能够体察国内外形势，针对本国国情有的放矢地译介西学，从而激活了沉滞不前的中国文化思想界。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赴日学人在传播西学的过程中，不但将西学思想启蒙大众，而且他们自身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传播的西学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中国近代哲学史、文化史和传播史，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期工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学术界往往对清末赴日学人传播西学的工作采取略写和淡写，致使让人误认为是俄国十月的一声炮响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之前的赴日学人更早地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进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国近代哲学思想演化的轨迹出现某些断裂。为了逐步消除这种“断裂”,探讨 20 世纪初中国哲学产生变革的文化原因,本文对梁启超传播西学的主要内容、历史地位 and 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同期赴日学人在中国西学东渐史上的作用,以及它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本文“清末”一词与陈启伟教授的《清末法国哲学东渐述略》一文中的“清末”是同一意义上的概念。^① 不过,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从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这段时期的“西学东渐”。第二,“西学东渐”是指清末以来的欧美的哲学理论、社会思想、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等诸方面大量涌进中国,所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第三,本文主要采取三种研究方法:1. 史料考证的方法。广搜材料,考索源流,辨析真伪,诠释有据。2. 理论分析的方法。运用哲学理论对材料进行细致分析,以达到史论相结合。3. 思想比较的方法。通过比较,凸现介绍者的思想启蒙作用、历史地位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① 陈教授所使用的“清末”一词基本上是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至辛亥革命一段时期。具体见《外国哲学》第 15 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第 247—272 页。

第一章 梁启超传播西学的历史背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已历经风雨飘摇,中国人为探索国家出路也对西学的引进有了一个不断反思的过程,而此時期的“西学东渐”就是在中国社会较为复杂的环境下有选择性地进行的,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西学东渐”中传播进中国。在这项工作中,赴日学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梁启超是其核心人物之一。要探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清末赴日学人在“西学东渐”史上做出了哪些贡献,则必须对这个时期西学传播的社会背景、主要输入渠道和大体内容,以及国人对西学了解的情况作一宏观性的梳理,是有必要的。

第一节 清末西学与赴日热潮

在梁启超赴日之前,“西学东渐”已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进行了,而且逐渐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过渡。梁启超赴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西学东渐”的规模逐年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可以看出,这种规模性是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 戊戌变法之前的国内西学译介

西学的真正传入,或者说,国人开始正视西学,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① 鸦片战争及其后几次战争的失败,使国人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学习和引进西学。但此时期的“西学东渐”是被动性的,而且“西学”充其量仅指西方的“技术”“技艺”而已。换言之,像魏源、龚自珍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和其后的洋务派领袖没有主动自觉地接触西方的“真谛”。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西学”还不包括西方的哲学、政治等在内的西方思想和精神。

有理由说,在甲午之前,国人对西学的传播数量较少,了解极其肤浅,其影响也小。有学者就指出,“在1840年后的将近半个世纪以内西学的输入是缓慢的,它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是表面的,特别是和西方文化在19世纪日本的迅速发展及其改造影响相比就更加明显……”^② 拿当时曾提倡学习西学最积极而显赫一时的洋务派官僚人物——张之洞来看,基本能窥见那时国人对西学的了解程度,有一知万之实情。“彼张公者,岂曾知中国为何状,岂曾知西国为何物,岂曾知西人為何学,而贸贸然号于众曰:‘吾知西法者’。世人亦贸贸然推之曰:‘是知西法者’。夫天下无一人知

① 正如有人所说:“‘西学’一词暗示这种新的文化意识,它只是慢慢地得到传播和受到尊重。”“西学的思想派生出许多其他概念,‘西学’和‘新学’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过,‘新学’一词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来。西学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从欧美输入的各种不同的知识”。见[英]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② [英]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

西法者。”^①这是指责张之洞之流没有掌握“西法”之精髓。回顾历史,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接受西学的内容与形式的改变,代表洋务派先进者的张之洞已不再局限于曾国藩、李鸿章所主张的“器械”、“校技”等“器物”上,视野更加开阔。他在国内组织了几家译书机构和译书团体,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新知识,其译介的西学已涉足到“西政”和“西艺”两部分。但是,这种视野的开阔性是有限的。尽管其译介西学已涉及西方的教育、科学、军事、法律、经济和行政措施等,但它却排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学说,以及兴民权、开议院等的制度措施,而且西学只是作为应世事之用,却不能作治国之本。

甲午之前,国人译介的西文书数量有限,日文书也是寥寥无几。甲午之后,出于向日本学习的强烈愿望,中国各阶层、各派人士都十分强调翻译日文书的重要性。1896年5月,侍郎李端棻上奏,认为“欲求知彼,首在译书”,主张设立译书局。^②随后,张之洞也认为:“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为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译西书不如译东书”。^③尽管如此,他们对西学的认识仍是极其肤浅的。应该说,没有有意识地去涉足西方的政治国家学说和哲学思想,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之共性。鉴于此,梁启超认为,一旦国人对西学真正有了了解,“而进步之骤,将不可限量也”。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张之洞都不知西学;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无救了。这说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

① 梁启超:《地球第一守旧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以下出自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不再注明作者、出版处和年份。)

② 李端棻:《清推广学校折》,见《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5页。

③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相对于洋务派那种移花接木式的生硬学习和应用西学不同,维新派人士对西学的传播就“有的放矢”了。虽然维新派在某些方面对洋务派有着历史承继性,但二者已有本质性的区别。早在19世纪60到80年代,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就大声呼吁要“采西学”,传播和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议会制,并且比较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和封建专制的君主制。1897年,康梁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明确宣布其翻译对象“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这是维新派人士打破“中体西用”的思想束缚,倡导“变法自强”,以求变、求强、伸张民权与自由以及立宪法、开国会等为已任,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从而从根本上有异于洋务派。然而,维新派的这些主张的实施绝大部分是在戊戌变法之后落实的。

近代输入西学的主体虽已逐渐转为中国人,但外国传教士的翻译和介绍也不可忽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迎合世界潮流和中国发展的现状,传教士们在传播西学时已不能仅考虑自方的利益,而要面向全局。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之间,传教士通过报刊等媒介输入了大量的西学,尤其对西方哲学作了有益的传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有艾约瑟、丁韪良、李提摩太等人,他们在《中西闻见录》、《西学启蒙十六种》、《西学略述》、《西学考略》、《泰西新史揽要》和《万国公报》等报刊上都不同程度地介绍了西学。应该看到,他们对近代西方先进知识的传播只是零碎的、片面的(关于这点,本文后面将有所探讨)。不过,在当时获取西学途径不通畅的情况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传教士的文化传播还是比较推崇的。

所以,戊戌变法之前,由于受世局的限制,加上自身的某些缺

陷,对西学的传播力度不大。其中,“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的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四篇政论文章,以及随后翻译的《天演论》,开了译介西学“精髓”的先河。严复所译介出的“天演”、“物竞”、“天择”、“淘汰”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一般爱国之士的口头禅。^① 不过,这些相对于戊戌之后的译著数量则少得多。其他人更不待言。20 世纪初的前几年,国内的译书机构几乎无有增加,传播西学受限制的力度有增无减,形势不为看好,像上海的同文书局只是暗地里偷偷印发留日学人传递过来的文章。但形势恰恰相反的是,一衣带水的日本境内,中国赴日学人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译介西学热潮。翻开这一历史扉页,不难看出真正领导译书潮流而起主导力量的是那些有志救国的赴日学人。相比较而言,无论在传播规模上,还是在传播西学的“精髓”上,清末时期国内引进的西学远远赶不上同期赴日学人译介来的西学。

二 赴日热潮与西学传入

清末的“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中它与民族危难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国家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的危机,带来了赴日热潮这一历史现象。同时,这一现象又为清末西学的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

甲午之役是赴日的一大机缘。19 世纪末期,随着内忧外患的凌迫,民族日益阽危。1895 年的甲午战争败北,标志着洋务运动

^① 参见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6—47 页。

败于明治维新,^①中日文化的交流方向开始发生大规模的逆转。故而,张海林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说:“中日文化交流方向逆转的起点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彻底变化的标志点则是1894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②当时国内知识界人士都觉察到国家的大患已来临,国人在亡国灭种的灾难下完全觉醒了。关于“觉醒”一词用在此处最为恰当,著名学者陈旭麓曾给出很好的解释:“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并不归结于愤激,其确定含义应在于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一个阶级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③的确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有多少次的愤激,却未觉醒,而这次却彻底认识到国家各方面的危机,自觉承担起自家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了。

伴随着这种历史使命感,国人们便想方设法地寻找救国方案,为救亡运动而奔波不停着。与每一个热血青年类似的是,梁启超也是在甲午战败后增强了变革现实的决心,激发了强烈的爱国心。他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④梁启超已明确意识到,中国的落后绝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薄弱,而是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落伍和腐败。这就是后来他所指陈的,洋务派重视军事却不知民权,知变法却不知本原,视洋务误为国务,失败则是必然的。因此,变革的关键是从“体”上改变不合理的政治体制。然而,站在时代前面的总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作为“先觉者”,强烈要求学习西方,效仿日本实行变法维新。于是,由“先觉”引导“后觉”,全国掀起了

① [日]伊原泽周:《从“毛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版,序言。

②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③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第1页。

一股全民式学习日本的浪潮。它表现在：一方面，仿效日本在国内各地开办东文学校，并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另一方面，涌现了大批中国人赴日留学，出现一股“留日热”的盛况。然而，前者比后者在传播西学上的成效逊色得多。

实际上，自从日本明治政权的胜利，通过实行一系列的维新改革，国势急剧增强，清政府就意识到日本并非是昔日的“东夷”，遂很早地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从那时起，就标志着中国开始重视日本。于是，紧接着于1877年的派出何如璋为第一任赴日公使，是为中国对日看法的真正转变，这可从何如璋的《使东述略》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得到证实。尤其黄遵宪呼吁国人全方位地学习西学，从而打破了往日文化人的傲慢之态，扭转了中国知识界认知日本的褊狭心态，表明了某些知识分子渴望了解日本、学习日本的心愿。不过，这仅是知识阶层中的有着局限性的举措，尚够不上成规模性。

倘若说甲午之前的赴日只是蠢蠢欲动，那么甲午之后的赴日则呈现出咄咄逼人之势。青柳笃恒将此时期的赴日情景描述为：“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中留学之实情也。”^①留日学人多为青年学子，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妇女，就连白发老翁也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还有的全家、全族留学。在留学生中，或者为官费选派，或者为自筹资斧。总之是纷纷东渡，络绎不

①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7页。

绝。除留日学生外,还有流亡、逃亡之徒,诸如康梁等。他们总体上可称为“赴日学人”。出现赴日热潮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危机的刺激和国人觉醒的结果,这种危机性的刺激便形成了民族自尊心。民族自尊心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成为一种个人自尊心,这是外因转化为留日的内因之所在。

赴日热潮的形成与清政府的提倡和奖励是密不可分的。1896年,清政府选派唐宝锷等十三人留学日本,开启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先河。1898年3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并列举了留日的有利条件和理由,诸如交通便利、节省费用、语言同种、习俗相似等等,能够起到“事半功倍”之效。^① 1903年,清政府又正式颁发了由张之洞拟定的《奖励游子弟毕业生章程》。赴日热潮同时也是迎合了日本政府的决策。甲午之后,日本政府为了加强与西方列强的争夺,对清政府采用笼络策略,劝说中国派学生留学日本。它表面上是为增加两国感情,实质则培养亲日派,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势力。倘若说日本政府是用心不轨,那么日本在野人士所表示的欢迎则是真诚的。清政府与日本朝野的这些举措,对留日热潮起到了强有力的外动力作用。在此外力的推动下,加上国难当头的危机化成了内在救国动力,二者结合持续了近十年的赴日盛况。^②

赴日热潮直接涌现了大批的赴日学人,他们大都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到达日本后,第一件事就是传播西方的先进思想。“留

① 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

②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8—39页。又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5—356页。

日学生把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责任”。^① 赴日热潮与翻译团体的设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译介日文书成为主要对象,日译西学也就被广泛地传播开来。^② 随着赴日学人的逐年增多,他们在日本所创办的译介机构(包括团体、学社等)层出不穷,报刊数量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所译介西学络绎不绝。以省为单位者,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译书汇编》等,都大量专刊式地传播西学,是国内报刊所不及的。《新民丛报》、《民报》更不逊色。这时西学的传播已不是在特定的框架下受限制地进行,而是“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地介绍西学。原因在于传播机构绝大部分设在国外,尤以日本为主。这些译介团体人数多寡不一,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各个团体所译的书互有侧重,有的译介欧美法政,有的译介经济学,有的译介中小学教科书,等等。各种刊物多达数十种,有的以单行本印行,有的以丛书形式印行,也有的在刊物上连载。尽管这些刊物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目标和宗旨也不尽相同,但在爱国情感上是一致的。故而,他们用尽各种救国策略,从中寻找各种救国救民方略,各尽其能,不断更新译介内容,争先译介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应该说,这对启发民智是极为有效的。

这一时期,从西学传播的数量和内容上来看,是极为可观的。“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西书533种,日文321种,占总数的60%;从1900年至1911年,共译西书

①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7页。

② 留日热潮集中于1899年至1906年,而译书团体大都是在此期间建立的。具体可参考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五章,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04—248页。翻译团体的设立可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69—373页。